

以琴为梯:普通家庭音乐特长生的成长叙事研究

■ 安 超 关 阳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摘要】艺术学习对于高考生是奔前程的工具还是纯粹的艺术陶冶?高考背景下的艺术学习又呈现何种样态?本文通过对音乐特长生进行成长叙事的撰写,发现在竞争激烈的升学背景下,学琴“有用”、学琴“有价”、学琴“有声”在音乐特长生成长过程中呈现复杂的张力。艺术教育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家长视其为高考的“捷径”,但艺术学习并不轻松,艺术训练蕴含着一套苦练文化与高度排他性的“攒证书”文化,带有异化特征。特长生的艺术学习离不开家庭的雄厚经济投资、高强度时间积累和高情感陪伴。对于经济与文化资本不足的家庭来说,时间积累和情感陪伴作为补偿型教育策略,成为促进学生学习、支撑学生坚持下来的关键力量。尽管艺术学习在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实用取向,但学生的艺术兴趣会借由艺术本身的魅力和家庭、学校、教师构建的艺术气氛烘托维持,给学生带来意外的精神陶冶,助力学生的全面发展。艺术学习帮助学生实现个人的资格化、社会化与主体化,成为应试教育背景下个性发展的良好补充。艺术学习的工具性与纯粹性在高考模式下可并存,在高考赛道之外,我们也要关注到艺术赛道给予个人主体性生成的独特成长“礼物”。

【关键词】艺术教育 音乐特长生 家庭资本 时间资本 情感资本
成长叙事

收稿日期:2024-03-12

作者简介:安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首都高端智库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教育社会学、教育与社会政策、家庭教育;

关阳(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家庭教育、教育社会学与教育人类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双减’政策背景下教育焦虑的综合纾解机制研究”(课题编号:2021NTSS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奔前程：艺术学习成为实用主义的投石器

艺术是一门技术还是审美产品,往往取决于生产者的“意图”。艺术应是纯粹的,但艺术教育却常常被功利性所左右。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曾指出:“如果说没有什么比音乐上的趣味更能显示一个人的‘阶层’,更能对一个人进行归类,这当然是因为,由于获得相应配置的条件稀缺,没什么比听音乐会或演奏一种‘高贵’乐器这种实践更能分类了。”^[1]学音乐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特定群体的生活,是修养与品位的象征。中产阶级为了彰显个人的身份,提升自己的地位,往往在审美选择上与上层阶级趋近^[2]。而中产阶层家庭也在阶层区隔观念的影响下,纷纷为孩子购置乐器,想让孩子拥有一技之长,渴望孩子“鲤鱼跃龙门”,乐器成为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标配,家长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将孩子托举到更高的平台,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随着教育竞争愈发激烈,艺术学习也被视作助力升学的工具之一。为了使孩子圆梦高考,许多家庭举全家之力支持孩子成为艺术特长生或艺考生。很多研究表明,有诸多因素同时参与了艺术生的职业化过程,市场、体制、学校共同塑造了艺术生的审美自我,为他们进入艺术界打下基础^[3]。在表面繁荣的艺术教育背后,隐藏的是技术至上与功利主义的暗潮。闲暇不再只被看作是艺术创作的基础^[4],人人都在学艺术,尤其是忙于学业的孩子。布尔迪厄认为,对高雅艺术的欣赏能力对学生的学业有促进作用。拥有艺术鉴赏能力更容易在学校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让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女产生“优越感”,更适应学校的模式,进而取得学业优势^[5]。艺术特长生政策的颁布开拓了家长们为孩子奔前程的入口。家长想尽办法为孩子寻找“捷径”,艺术特长生通道便成了家长的投石器。不同于一般的高考生或只以专业课或艺术能力为主进行考核的艺考生,高考的另一条路是成为兼顾成绩与艺术的艺术特长生。但这条路是否真的是捷径?高竞争环境下的艺术学习是否真正具备艺术性?艺术特长学习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支持性力量?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基于文献研究我们发现,学界对音乐生的分析主要聚焦于音乐技巧的教学研究,而且主要从成人角度或授课教师的角度去分析,缺少音乐生的当事人视角,且质性研究尤其是叙事研究较少。探究艺术特长生真实的学习与成长状态,离不开对艺术特长生生活的深描。基于以上问题,本文通过对关阳同学作为一名艺术特长生考上985大学的成长叙事研究,探讨艺术特长生视角下艺术学习的意义与机制,以及艺术学习与青少年成长的复杂关系。

音乐特长生的体验分散在广阔而绵长的时空之中,在乐曲演绎中表达内心的痕迹,不知不觉中成为一种惯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特长生的生活。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可以从旋律中捕捉,也可以从行动者本人对过往的回溯即成长叙事中寻觅。叙事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或者方式”^[6],每个人都在有选择地编织着自己的生命图像。叙事既是生命意志的表达,也可被视为一种方法,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身处的世界^[7]。

在后现代思想浪潮下,传记因其对研究对象主体性的彰显,文本的生动、多元和丰富,受到诸多研究者的推崇。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erton)率先提出了社会学自传(socio-

logical autobiography)的概念,认为“自传作者能够以他人所不能的方式反省和回顾自我”,因此本研究采用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的方法开展研究。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范式,自我民族志是一种将个体与文化相连的自传式个人叙事方式,通过亲身体验与自我意识来表达文化、讨论文化,加强对文化的解读^[8]。与传统质性研究的访谈不同,本文两位作者分别以局外人和局内人的双重视角呈现关阳同学的成长叙事,并加以理论分析,旨在探讨音乐特长生的成长与教育支持机制。

二、学琴有用:作为升学工具的“小高考”及其竞争过程

对于艺术特长生而言,艺术类自主招生的考试成绩对于高考来说只是锦上添花,是否能上好大学,最主要依靠的还是文化课成绩。在筹备艺术特长考试的时候,艺术特长生主要将其当作一次“小高考”,艺术学习也在升学的影响下逐渐高考化,并由此构建了艺术学习中的苦练文化和“攒证书”的排他文化。

(一)“老茧”:艺术学习中的苦练文化

学琴离不开练琴,练琴离不开时间与忍耐,而“忍耐则是与时间关系上最伟大的品质,是放弃擅自超前的做法而与那些应按自身规律发展的事物保持步调一致的能力”^[9]。艺术界有一句老话,“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一周不练老师知道,一个月不练所有人都知道。”艺术技艺的提升需要坐得住冷板凳。练习可以帮助演奏者巩固基本技能,扩展技术范围,发现自我风格,发掘情感内核^[10]。心理学家K.安德斯·埃里克森(K. Anders Ericsson)曾在柏林音乐学院展开研究发现,未来演奏大师的练琴时间超过10000小时,并得出结论,“一旦一位演奏者进入顶级音乐学校,唯一能使他出人头地的方法就是:刻苦练习”^[11]。曹矛在论基本功对乐器学习的重要性时也指出,熟练的运指技术是学习者或演奏者必备的素质,需要学习者进行系统、规范和针对性的训练^[12]。熟能生巧,只有磨时间、反复练习才能熟记大量乐谱,才能将作曲家谱写的曲子流畅演奏下来,因此“老茧”就成了弹琴者身体上的印记。

没有小孩愿意一直进行枯燥的练习,所以我的童年练琴底色充斥着泪水与烦闷。我学的乐器品距宽、弦也硬,弹完一曲手指和手臂总会酸痛,因此我也总是会偷懒,在家长不注意的时候,练一些轻松的曲子或我已谙熟于心的技巧,消磨每天铁打不动的一小时练琴时间。但因偷懒技巧还未成熟,我的伎俩也总会被家人发现,便会要求我认真练琴,琴板上现在依然留着我当时练琴淌下的长长泪痕。

高考前的最后一个寒假,我一天练八个小时的琴,手上划出了一道道口子,导致我必须贴着创可贴才敢摸琴,创可贴成为我弹琴的必备道具之一,更不用提长年累月练琴手指上磨出的茧子。

若想在演奏上取得成绩,苦练是必不可少的。苦练是学琴的底色,在一次次的按指与拨弦中,在音乐特长生的学琴生涯中形塑了苦练文化。艺术中的苦练文化具有易检测性,如果没有认真练习,在下一次学琴的时候就会被老师发现。艺术中的苦练文化也是演奏的基础,没有苦练、不能娴熟地演奏音乐,也就无暇领悟到乐曲中的内在精神与艺术魅力。走上艺术之路的人,

最主要拼的就是谁练习得更久。

(二)“攒证书”:排他性的资源竞争

艺术特长考试也是高竞争性的活动。每所学校给的降分名额是有限的,考琴需要经历资料初筛和现场考试。证书数量是艺术特长考试的敲门砖。“孩子们参加的课外活动转化为一张张凭证,构成他们一行行的简历。简历越丰富,就越能在学校选拔中取得优势。”^[13]在艺术学习中,考级证书、参与演出活动与艺术比赛的证明都是反映音乐特长生综合能力的依据。因此,特长生们总会在家长陪伴下前往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参加展演比赛,丰富自己的考学资料,让自己的证书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取得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一起学琴的伙伴既是战友,又是竞争对手,每个人都会密切关注其他人的一切行为。

我记得去国外艺术交流的时候,为丰富我们的履历,乐团为我们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当时有同学凭借家庭关系在音乐会上获得领奏角色,印有她名字的节目单便在她的申请中成为竞争优势,但这一行为也被其他随行同学发现并质疑,最终领奏不了了之。

除了证书,乐器与乐曲的选择也是考生在艺术特长考试获胜中重要的一环。曲目选择也是需要竞争的。因为高级别乐曲数较缺少,倘若你的演奏技术一般,老师就会为了避开短板,为你选择一首看似高难度实则只是声势大的乐曲,这样就很容易与其他考生选择的乐曲相同,增加竞争。但若你的技术较为精湛,老师便会把他最得意的作品拿出来只教你演奏,因为他只信任你可以演奏好,也愿意倾囊相授,这样就能在考试中让评委耳目一新,增加优势。在关阳的努力练习下,她就获得了一首老师独传的乐曲,也因此信心大增。

部分老师也会帮同学打掩护。高考临近之时,老师不会对考生说其他同学现阶段的水平如何,避免大家选择同一所学校,增加内部竞争。除了暗处的竞争,老师也会在各所学校初试公示后,打电话问大家哪些人被录取了,劝大家分散着去复试。关阳当时收到了两所学校同一时间的复试通知,老师就会建议她去另一所,希望大家不要内部互相竞争。

艺术特长生是需要经历两次大考的人,所以在高考模式的竞争惯性下,艺术加分考试也被当作“小高考”继续竞争。大家都盯着最高学府,各自使出浑身解数,倾尽家庭和社会资本,并相互掩藏着各自的实际实力,在平静的水面下暗暗较劲。他们会沿用高考式的努力,致力于在每一场比赛和表演中比同伴表演得更好。

艺术学习在中国有一定的实用主义倾向,在艺术学习过程中,教师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抹上功利主义色彩。平时老师只注重对学生基本功的机械练习,在学生考级那一年甚至不再教授新曲目,只让学生练习考级曲目。更有甚者,告知学生只要把曲子死记硬背下来就可以在艺考中拿到不错的成绩^[14]。艺术学习的审美性逐渐削弱,留下的只有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工具理性。

三、学琴有价:艺术学习的经济、时间和情感账

为了让孩子在高考的艺术特长考核中一骑绝尘,家长们使出浑身解数为孩子赢得更有利的艺术学习机会。布尔迪厄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基本单位,家庭资本的资源有利于学

生个体教育的发展^[15]。科尔曼(James Coleman)将家庭资本细化为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16]。杨启光则在研究中详细阐释了家庭教育资源,将其分为包含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背景与家庭的传统文化等的客观要素以及包含家长的教育期望、教养方式、家庭的情感气氛、家庭对话的质量等主观要素^[17]。家庭资本在艺术学习的投入中占据重要地位。

家长是孩子学习音乐的主要决策者,家长对特长生的投资方式一般是间接的,即家长提供经济支持购买社会艺术教育服务为孩子辅导^[18]。科尔曼将家庭中亲子关系视作是一种“社会资本”,认为这是家庭资源影响孩子资本发展及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关键因素^[19]。也有研究表明,音乐学习受多方面家庭因素的影响。学生音乐学习的动机与家庭的经济收入与文化水平、管教方式、亲子间的感情和家庭结构都有一定关联^[20]。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期待借由家庭资本展示各自的教育参与方式,家长更是倾其所能调集家庭各种可能的资本,以最大的支持参与到子女教育中。在关阳的艺术学习过程中,她认为家庭所给予的经济投资、时间积累和情感陪伴最为重要。

(一)经济投资:高昂的艺术消费

在艺术学习开始兴盛的20世纪90年代,数万元的钢琴价格、每小时上百元的课时费,对当时的大多数家庭来说都很吃力,但不少父母依然展现出“砸锅卖铁也要学钢琴”的决心,有一位母亲甚至不惜当掉所有的金银首饰^[21]。在一则新闻报道中,因艺术学习巨大的开销,许多家长即便在孩子没有兴趣的情况下,也不甘心放手。某某的孩子上一节艺术课需要400元,钢琴是花3万多元买的日本进口卡哇伊。某某买钢琴则花了26000元,学琴六年下来,每年交的学费都得好几万^[22]。艺术学习的开销考验家庭的经济状况。

在关阳上幼儿园学电子琴的时候,父母的经济收入一个月只有1200元,外公外婆负担了她学电子琴的费用。当时买电子琴需要4000块钱,而这笔钱则由关阳的太姥姥支付。此外,还有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比如报名考级、参赛、演出、视唱练耳学习费用、演出服装费用、专业录音费用,再加上学琴的私人家教费用、报考学校的费用,以及前往学校考试的各种费用,对于中产阶级家庭来说,这些都是一个个难以预料却依旧要摇摇晃晃坚持下去的消费难题。

(二)时间积累:海绵里的水

苦练文化由时间积累而得,时间在音乐特长生眼中更为珍贵,既要艺术苦练,又要在文化课上勤奋练习。当时的时间安排对于关阳而言是没有浪费余地的。关阳戏称“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因为去学琴的路程较远,一个来回通常需要耗费一天的时间。最初关阳与母亲乘公共交通出行,关阳则会带着作业在车上完成,也引来车上很多关注的目光,但关阳知道,“时间不等人”。随着课业越来越紧张,关阳父亲便会开车接送她去弹琴,减少路上花费的时间,关阳也照旧利用路程上的时间争分夺秒地学习。她会事先把需要记忆的知识点录进手机,在坐车的时候戴着耳机反复背诵。除了抓紧学业的时间,关阳也会认真对待学琴和练琴的时间。她不再对弹琴敷衍了事,而是仔细练习自己还弹不顺的地方,让每一门课程都上得有价值,而不是无谓地重复与练习,以让自己的技术在老师的指导下快速提升。

表1 关阳艺术考试前夕每周的时间安排

| 时间 | 事件 | |
|----------------|--------------------|-------------|
| 工作日 | 白天 | 在学校上课 |
| | 傍晚自习课 | 练琴一小时+回教室学习 |
| | 回家后(22:00-24:00) | 练琴一小时+学习 |
| 周六(7:30-24:00) | 白天 | 在家学习 |
| | 晚上 | 练琴至少一小时+学习 |
| 周日 | 白天(7:00-14:00) | 上琴课 |
| | 下午+晚上(14:00-24:00) | 练琴一小时+学习 |

谢爱磊等研究发现,中上层社会背景的学生更愿意参加积累文化和社会资本的文化活动,对时间的有意策略性使用可以为个体带来社会优势,促进发展^[23]。紧张忙碌的节奏反而让关阳知道了时间的可贵性,并且学会平衡时间,也让关阳比大多数同学更加懂得利用时间。她在时间的缝隙中穿梭,平衡学习与休息的时间,在忙乱的高考生活中忙中有序地开展学习,变得更加自律和自主。除了关阳自己的时间投入,艺术学习离不开家庭合力的时间付出。董书昊等人的研究表明,在一段关系中,双方在互动中投入的时间少,是双方网络异质性产生的重要原因。与对方互动越频繁,就越易进入对方关系网中,进而呼吁关系交往中应关注时间投入因素^[24]。顾天竹等人的研究发现,父母陪伴使子女拥有和谐健康的成长环境,与课外投资相互促进,对子女教育的影响较经济投入而言更为有效^[25]。家庭教育的亲子互动与交流等时间投入有利于形成一种支持性社群,促进弱势阶层家庭通过家庭教育实现阶层向上流动,是影响子女学业成绩的主因^[26]。家庭合力的时间投入让关阳感受到了家人更多的爱,也获得了学习优势。

(三)情感陪伴:兴趣的维持与气氛的烘托

博尔诺夫(Otto Friedrich Bollnow)将生活环境中一定的内部气氛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一定的情感态度称之为教育气氛,并将它理解为情感、情绪状态及对教育抱有好感或厌恶等关系的总和^[27]。具有优势文化资本的家庭将资本的优势传递给子代,而文化资本不足的家庭则通过情感性资本促进子女的学习。情感性资本是指一定主体所拥有的,通过在社会交往中激发、投入从而获得回报的有价值的情感资源^[28]。关阳认为,情感资本是她得以坚持学琴的最重要的支持性力量,正是母亲、太姥与学校老师的支持与鼓励,让她得以坚持学琴,并逐渐爱上弹琴。

1. 作为“陪学者”的母亲

“每个神童的背后都有着野心勃勃的家长。”^[29]家长的支持对于音乐学习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正如《音乐神童加工厂》中记录的,家长除了监督和辅导孩子的日常学琴任务,还负责帮助孩子收集乐谱材料、买音乐教材、抄写指法等^[30]。关阳妈妈也在她的学琴生涯中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妈妈一直支持我的选择,并坚持让我学下去。她陪伴我学琴、帮我换琴弦、对我练琴进行指

点。高三那年,妈妈在学校附近给我租了个房子,她每天早起给我做丰盛的早餐,送我上学,接我放学。在最后艺术报考的时候,她四处奔波,收集材料,填表到凌晨,她还会帮我去学校盖章,寄给各学校,不太熟悉电脑和规则的她,也在我的需要下,一点点研读每个学校的细则,安排我高三的出行计划。在我外出考试的时候,妈妈还会一直在考场外面等着我,冬季的寒冷从地面袭来,她的脚因此落下病根,之后不能久站。

受教育市场化的影响,母亲的教育职责出现“经纪人化”特征,即母亲全方位了解教育市场,为孩子精心定制教育产品,帮助子女在教育竞争中取得优势^[31]。关阳妈妈正是这样一个角色,为孩子准备好学琴路上的一切资源,让孩子只需安心学琴、练琴,在陪伴孩子学琴的过程中,“从不懂到快变成半个艺术家了”。

2. 作为“伯乐”的太姥

妈妈承担了陪伴者的角色,而关阳的太姥则扮演了“伯乐”的角色。她是关阳最忠实和专业的观众,不仅能指出演奏的不足,还能给予即时的情感反馈,给了关阳持续不断弹琴的动力。

每次学到一首新的好听的曲子,我就把琴带到她家,给她弹琴听。她总是乐意放下手中忙碌的事情,端坐聆听,会从陌生的曲子中品出她熟悉的味道,与我共享记忆,或是随着熟悉的歌曲旋律轻哼,让我感受到我的音乐是有价值的。

从经验判断来说,高质量的情感陪伴作为普通家庭的补偿教育策略,包含了家长大量的情绪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情感资本的范畴。社会学中对情感资本的讨论始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道德情操论》,情感资本是情感所具有的道德品质与配置。林南强调了情感性行动在社会资本中的意义与价值^[32]。特纳(Jonathan H. Turner)承认了情感资本是一种社会学中的资本形式,并逐渐发展其理论^[33]。情感资本包含社会情感关系本身和情感资源的质量和数量^[34],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认为,情感能力不仅是一种可以转化为社会资本或帮助人们在工作领域取得晋升优势的资本形式,它也是一种资源,能够帮助普通的中产阶级在私人领域获得寻常的幸福^[35]。情感支持对于道德教育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人们会通过情感体验触发道德机制,也会促进情感在道德实践中转化为道德力量,帮助人们提升社会情感能力^[36]。这种情感资本在中国家庭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家长愿意为了自己的孩子牺牲个人利益,将孩子的未来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正如关阳所说,“没有她们对我的牺牲、支持和欣赏,我无法认真对待弹琴与练琴,更无法将弹琴视作艺术的表达,用从容的心态在考学中运用情感与技术获得降分。”不过,由于“情感资本”作为新兴概念,其定义尚存在争议,内涵和外延尚未明确,我们从经验层面对家庭情感陪伴是一种“情感资本”做了论断,但其内涵和外延,尚需要严谨的学理论证,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四、学琴有声:艺术学习的成长“礼物”

“音乐起源于人类的‘自我表达’和‘彼此交流’的欲望。”^[37]在人的情感与社会交往的发展中,人们逐渐通过音乐来表达自我,音乐被看作是自我的展现。真正的艺术源于兴趣与最原始的冲动,也会反作用于人身上,治愈人、陶冶人^[38]。人们在艺术中观想自我,反观世界。即便是

相同的音乐,每个人表达的内涵也是不同的。尽管关阳的音乐学习主要以升学为动机,经历了“苦练”的过程,但艺术内在的审美价值,以及通过学琴参与课堂学习之外社会生活的过程,让关阳意外收获了很多成长的“礼物”。

(一)见世面与不怯场

“每件艺术品中都自然且合理地存在‘为了言说而言说’的自利性愉悦,但同样我也确信,没有人愿意在全无听众的荒漠里演说而不被听闻。”^[39]艺术学习除了帮助升学之外,也给学习者带来了高光时刻、自我肯定等成就性体验。在特长考试的要求下,关阳离家奔赴不同城市参加大大小小的比赛和演出,从小城考场、到外地考级现场,从社区展演再到合奏比赛现场,从独奏赛场最后走向国际舞台,在一次次活动体验中享受舞台、结交伙伴、见识世界。舞台上的不怯场对关阳而言是艺术学习赐予她的意外礼物。从最初的畏惧到在各种场合都不怯场,再到高考也不临危不惧,离不开关阳在大小舞台上的锻炼。

我在家长、老师和亲友的特别关注下继续学琴,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建立自信,获取身份认同。没有人不喜欢被赞赏,在感受过多次成就性体验后,我为了保持现有的位置,继续在高考赛道上加速奔跑着。我努力、小心维护着“弹琴弹得好,学习学得也好”的这种形象和尊严。

在舞台展演中不断获得他人认可与自我肯定促使音乐特长生加强自我认同,在舞台的切换中感受不同魅力的文化,特长生们在琴的陪伴下见世界、建信心,完成了个体意义上的情感社会化。

(二)自由表达的“扩音器”

格林(Maxine Greene)在《蓝色吉他变奏曲》中指出,跟随老师学习可以让学习者拥有“特定的注意”,关注到艺术作品中蕴含的审美的品质,学习艺术作品中的审美表达及符号意向,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艺术作品中”^[40]。对于关阳而言,在高考压力与统一化的教学模式下,音乐给了她很多慰藉,手里的乐器成为她自由表达的扩音器。

艺术经验首先来源于他人给予我们的情感支持,让我们打开感官去感受生活,再由感知到的经验通过艺术表达自我情感。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41]。关阳遇到了一个好老师,教会她理解艺术情感,理解音乐的真正意义,并享受音乐本身的乐趣。

L老师不仅会跟我讲这首曲子怎么弹,还总会摇摇头打断我,亲自演示,这一段的情感应该是什么样的,甚至跟我讲他在什么情境下创作这首曲子。我在他的指导下,慢慢理解了愤懑的亡国之恨、哀愁的离别之思与快乐的游山之情,也会想象策马奔腾在草原上,与商队在广袤沙漠中跳舞,听着微风摇动竹林沙沙作响……我的肢体动作也随着真正的情感表达着。情到浓时,我也曾随着乐曲的起伏愤怒,快乐甚至伤心得颤抖。那一刻我才理解了音乐的真正意义,也更享受音乐。

法国哲学家巴彻拉德(Gaston Bachelard)强调指出,房子“是一种抵抗宇宙的工具”,“使人顶住一切自然的和人生的狂风暴雨”^[42]。在对艺术的理解中,琴逐渐成为关阳心灵的栖所,是她的房子,“在快乐的时候弹一些开心的曲子,将喜悦传递给更多的人,难过或者生气的时候则用扫弦和情感性旋律来宣泄,磨一些枯燥的很难的技巧耗尽自己的力气,又或是去弹一些悲壮的

曲子,让被压抑的情绪释放出去”。刚开始,弹琴对关阳而言只是技术性过程的内化与自动化,但在L教师的指导下,她逐渐理解了其中的艺术内涵,在经历挫折与压力后,感受弹琴时未完成状态的力量,与琴对话、与自我对话、与世界对话。

“通过意识,通过由审美教育引发的全面觉醒,我们的学生将在某种程度上自由地发现自己的声音,正如他们发现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一样。”^[43]经历了这个艰苦过程,音乐渐渐成为关阳生命的一部分,福祸相依,尽管艺术学习影响了她的高考成绩,却又带给她学校无法给予学生的一些社会能力的发展与自我的觉醒,“艺术于我,再也割舍不下,再也不会离弃。尽管最终高考成绩没有恢复到我的顶峰水平,但我始终认为学琴带给我的收获远远超过高考失去的几分”。在多次选择艺考还是文化课学习的徘徊后,关阳了解了内心真正的渴望,也对未来的目标更加明晰。尽管觉察到现实处境的复杂,但经过她自主慎重的判断,最终选择音乐特长生这条既需要苦学、又需要苦练的荆棘之路。

五、艺术学习的工具性与纯粹性以及主体生成

在竞争激烈的升学背景下,学琴“有用”、学琴“有价”、学琴“有声”在艺术特长生成长过程中呈现复杂的张力。在音乐特长生的成长历程中,艺术学习主要由功利性目标支撑,艺术学习的模式也遵循着高考轨道前行,并建构了一种苦练文化,以及“攒证书”的高度排他性竞争文化。音乐特长生的学习之路由家庭资本投入的大量经济资本、时间资本、情感资本所铺就,情感资本补足了普通家庭所不具备的艺术资本,成为平民子弟坚持走艺术特长道路的关键支持力量。尽管艺术学习具有一定的功利性,但对个体成长来说依然是有价值的,艺术自身具备的纯粹性与审美性抵抗着工具性的部分,激发个体主体性的生成,完成了特长生的资格化、社会化和主体化。

在家长眼中,艺术学习的价值随其在高考中的作用而变。田丰认为,在中国激烈的教育竞争和标准化考试的背景下,中产阶级家长对子女的高雅艺术培养的目的并非为了文化区隔,而是以教育回报为目标。在这种情况下,钢琴变得无用,家长们在升学竞争下纷纷涌入投资子女的艺术教育市场,又因学校对标准化考试的坚持削弱了钢琴的升学效用,又纷纷撤出艺术教育市场,转而为子女投资教育回报率更高的学业辅导班^[44]。因为对高雅艺术欣赏能力的培养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这占用了本该用于学习规范化考试内容的时间,反而对学业成就产生负面影响^[45]。家长们对孩子的艺术投资实际依然是对高考竞争的投资,而不是对艺术的真正价值的追求。

音乐特长生的艺术学习是家庭共同的“事业”,家庭倾注大量经济与时间资本,尤其是情感资本,支撑着音乐特长生的艺术兴趣,也渴望以此换来教育上的成就。本文揭示了尽管中产阶级家庭在对子女的艺术学习教育上无法像优势阶层家庭那样提供富足的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但他们会通过代际支持(祖辈代替父母支付学习费用)来缓解学习经费紧张问题,用时间积累与情感陪伴补足文化艺术资本的匮乏。我们认为,在这些支持中最重要的部分则为家庭与学校教师提供的情感支持和教育氛围,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母育文化与现代“密集

型母职”合流后产生的“新母育文化”。黄璟琿等人研究发现,中国母亲由于社会性别刻板印象与社会传统角色分工被视为家庭中的主要照顾者与教育者,且在中国传统考试文化的影响下,母亲主要负责养育子女及促进其学习成长。随着“密集型母育”成为全球流行的育儿模式等原因,部分中国父母尤其是母亲会牺牲自己的个人发展或个人生活来投资孩子的未来,提升孩子的养育质量。且在专家主义、市场介入和国家干预等科学育儿观念的影响下,儿童全面发展观念获得中国母亲认同,注重儿童个性化和自主性发展。在现代与传统思想的浸润下,在社会成功观念与尊重儿童自然成长的观念间,构成了中国母亲现代养育子女的模式^[46]。可见,艺术学习的背后蕴含着大量家庭资本尤其是母职投入垒砌出的努力与成就,也是传统与现代家庭模式的复杂交融。

尽管艺术学习存在很多功利性因素,艺术本身也不是沉睡的。美的艺术在生产过程中“使整个生命体具有活力”,使艺术家“在其中通过欣赏而拥有他的生活”^[47]。从个体角度而言,艺术学习依然是有价值的,在审美性培养与特长生主动性的发挥下,艺术的纯粹性抵抗着功利性的层面,艺术的魅力使艺术教育成为普通教育之外全面发展的重要补充。

比斯塔(Gert Biesta)在《教育的美丽风险》中提出,教育的目的主要有三个:资格化、社会化和主体化^[48]。艺术也在其中完成了对个人的全面教育。资格化在艺术学习中指技艺的习得,需要学生通过高考般的学习与苦练掌握;社会化是通过艺术教育让学生成为社会中的一员,在舞台积累与同乐器对话的过程中,体悟社会互动中的情感,在经验中融入世界;主体化则涉及学生的主体性,如解放、自由、责任等品性的自我生成^[49],如在高考的紧迫性下学会的时间管理,又如自我觉醒与反思的增强等。“音乐里洋溢着人性,故而反思音乐是人类观想自我的一种方式,音乐里映照着世界。”^[50]艺术教会学生与自我的独处。在理解了音乐的真正意义后,它也唤醒了关阳内在的自我。在一次次的教育中,让她明白,“什么对她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51]。她了解了内心真正的渴望,在复杂的现实处境中,也做出了自己慎重、独立的判断,也变得更为自律自主。

在关阳的成长经历中,艺术在为音乐特长生编织的复杂的升学网络中,实现了特长生资格化、社会化和主体化的过程。艺术唤醒了生活本身,避免学生成为单向度的人。以琴为梯,是家庭用来跨越阶层的工具,也是赠予音乐特长生实现个体成长、完成主体性生成的美好礼物。

[参 考 文 献]

- [1][2] 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版,第26、99页。
- [3] 晋军 卢晖临:《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2018-2021)》,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22版,第2620页。
- [4][37][39][50] 卡洛斯·查韦斯:《音乐中的思想》,冯欣欣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版,第131、6、106、15页。
- [5][13][44] 田丰 杨张韞宇:《钢琴无用:上海中产阶层家长的文化资本培养策略》,载《中国研究》,2019年第2期。
- [6] 康永久 施铁如 刘良华:《教育叙事:来自广州的视角》,载《教育导刊》,2003年第12期。
- [7] 程猛 史薇 沈子仪:《文化穿梭与感情定向——对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情感体验的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7期。
- [8] 蒋逸民:《自我民族志:质性研究方法的新探索》,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 [9][27][42][51] O.F.博尔诺夫:《教育人类学》,李其龙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92、41、80、58页。

- [10] 《为什么练习乐器如此重要? 你需要知道哪些练习技巧?》, <https://mp.weixin.qq.com/s/X3j1tu28DezYAvDI4O55eA>
- [11] K. Anders Ericsson, Ralf Th. Krampe, and Clemens Tesch-Römer. The Role of Deliberate Practice in the Acquisition of Expert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3, (3).
- [12] 曹 矛:《基本功在大管演奏中的重要性》,载《普洱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 [14][21] 《在中国,钢琴的“罗曼蒂克消亡史”》, https://mp.weixin.qq.com/s/gQ1O2hZw3huiTSiv_e36rg
- [15] 吴 炜:《兄弟姐妹对农村大学生教育获得的积极影响研究——代内家庭资本的视角》,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12期。
- [16][19] Coleman,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 [17] 杨启光:《家庭教育资源的内在认知及外在支持》,载《当代青年研究》,2007年第2期。
- [18] 景亚辉:《学生、学校、家长三方作用下的音乐教育研究》,载《戏剧之家》,2021年第11期。
- [20] 任红军:《民族地区普通高中音乐特长生音乐学习动机研究》,载《人民音乐》,2013年第11期。
- [22] 《中产梦醒,钢琴崩盘》, <https://mp.weixin.qq.com/s/Im0aO90TYJujxPnlEXU1g>
- [23] 谢爱磊 李家新 白宜凡:《时间的社会结构:文化资本与精英高校农村籍学生的时间使用》,载《复旦教育论坛》,2022年第2期。
- [24] 董书昊 陈心想 张 磊:《“时间投入”和“关系深度”——“关系强度”概念的二维视角及其意义》,载《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4期。
- [25] 顾天竹 马建富 孙 柔:《子女教育投入:金钱和时间孰轻孰重》,载《教育学报》,2021年第4期。
- [26] 李佳丽 何瑞珠:《家庭教育时间投入、经济投入和青少年发展: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影子教育阐释》,载《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8期。
- [28][34] 郭景萍:《情感资本社会学研究论略》,载《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 [29][30] 伊莎贝拉·瓦格纳:《音乐神童加工厂》,黄炎宁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版,第93、93页。
- [31] 杨 可:《母职的经纪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载《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2期。
- [32] 林 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 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233-235页。
- [33] 乔纳森·特纳:《人类情感社会学理论》,孙俊才 文 军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版,第165页。
- [35] 伊娃·易洛思:《冷亲密》,汪 丽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版,第75页。
- [36] 刘京翠 刘 雨:《情感育德:何以必要? 何以可能? ——基于社会学视角的探讨》,载《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5期。
- [38] 林庆楠:《高校音乐艺术教育中学习动机的激发与维持》,载《中国成人教育》,2013年第1期。
- [40][43] 玛克辛·格林:《蓝色吉他变奏曲:美的教育》,赵 婷 张华军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版,第8、21页。
- [41][47] 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80、30-31页。
- [45] Byun, S. Y. , Kim, S. K. K. .Revisiting the Role of Cultural Capital in East Asian Educational Systems: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2, (3).
- [46] 黄璟琿 谢均才:《中国社会的母育研究:当代议题与研究展望》,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 [48][49] 格特·比斯塔:《教育的美丽风险》,赵 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版,第11-12、11-12页。

(责任编辑:张 丹)